

理论视点

2016 年第 3 期 总第 19 期

西安石油大学党委宣传（统战）部 编印

2016 年 4 月



西安石油大学
新闻客户端



西安石油大学
官方微信

报送：省委高教工委宣传部、统战部，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研究室，
省委统战部六处。

抄送：校领导。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主送：各学院党委，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院（部、系），
机关、教辅、后勤各单位，各民主党派。

党委宣传（统战）部

2016年4月7日 印发90份

目 录

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1
在“两学一做”中突出看齐意识.....	7
推动全球能源革命的战略构想.....	9
高校建设“两个一流”应注重四个坚持.....	14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生成.....	16
“互联网+”：发展分享经济的引擎.....	22
锐词(19).....	29
推荐书目(17).....	30

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孙正聿

核心要点：

■ 对于人类自身来说，最为重大和艰巨的理论问题，莫过于揭示人类自身的发展规律；对于现代人类来说，最为重大和艰巨的理论问题，莫过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

■ 正是从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旨趣、道路和尺度出发，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和论证了人类历史的三种基本形态：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不仅在于它的实事求是的理论力量，更在于它的改变世界的实践力量，而且找到了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那就是无产阶级。

■ 我们必须从“历史的大尺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力量：就是以人类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去规范和引导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理念。

■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不是一个僵化的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于它集中地体现了时代的特征、世界的潮流和创新的实践，在于它引导人类以新的文明形态去破解自身发展的难题。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一句空洞的套话，更不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于它的实事求是的理论力量、改变世界的实践力量和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在于它是真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在于它为创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提供了最坚实的理论支撑。

一、理论力量：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

一种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首先在于它是否真正地揭示了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一种理论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则在于它所揭示的规律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和价值。

对于人类自身来说，最为重大和艰巨的理论问题，莫过于揭示人类自身的发展规律；对于现代人类来说，最为重大和艰巨的理论问题，莫过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作出这样的概括和评价：“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1002页）以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为实质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使人类自觉到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且使人类自觉到“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而为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伟大的社会理想，揭示了现实的发展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之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之所在。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309页）

在现代学科分类中，通常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然而，就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而言，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它既表达了人类解放的旨趣，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的承诺；又揭示了人类解放的历程，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过程的阐释和论证；也提供了人类解放的尺度，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价值标准反观人类全部的历史活动和整个的历史进程。正是从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旨趣、道路和尺度出发，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和论证了人类历史的三种基本形态：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版第30卷第107—108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为人类洞察和把握自身的发展规律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也为人类争取和实现自身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理论支撑。这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道义力量的统一。

离开对人类历史、特别是对“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现代人类就无法形成真实的社会理想和合理的价值诉求，就无法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和创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就会失去凝聚共识和走向未来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及其所具有的理论力量，就在于它实事求是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特别是“现实的历史”的发展规律，为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二、实践力量：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不仅在于它的实事求是的理论力量，更在于它的改变世界的实践力量。这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36页）他撰写《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从而“缩短和减轻”历史进程中的“痛苦”。（同上，第2卷第83页）

关于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马克思明确指出，前者只是揭露“现实的不合理”，后者则是批判“不合理的现实”；前者只能对社会主义作出种种美好的“设想”，只是“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后者则从现实出发，从人们的社会存在出发，指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进程”。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有机体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在社会形态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社会意识相对独立的历史更替中，肯定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并从这个“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中找到了最现实的批判力量，创建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从而使社会

主义学说由空想变为科学。

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改变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且找到了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那就是无产阶级。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列宁全集》第2版第23卷第1页）无产阶级作为具有彻底革命性的阶级，从自发走向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武器，肩负起了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鼓舞下，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开展，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出现。尽管一百多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有高潮有低潮，但它一直不断发展，并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展现出光明前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样，鼓舞了这么多的人、催生了这么多的国家、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这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力量。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用现实活化了理论，用理论照亮了现实，使得“朴素”的现实变得厚重深沉，使得“灰色”的理论变得熠熠生辉。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9—10页）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力量就在于，它赋予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以理想和信念，它赋予社会主义运动以最坚实的理论支撑。

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源于重大的现实问题，任何重大的现实问题都深层地蕴含重大的理论问题。理论之于实践的重大意义，理论所具有的巨大的实践力量，就在于它塑造、矫正和引导实践。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同上，第1卷第11页）人类历史的突出特征在于，“片面性”是它的“发展形式”，历史总是以某种退步的形式而实现自己的进步。历史过程中的任何进步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任何“正面效应”都会伴生相应的“负面效应”，任何“整体利益”的实现都会有某些“局部利益”的牺牲，任何“长远利益”的追求都意味着某些“暂时利益”的舍弃。因此，我们必须

从“历史的大尺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大尺度”，就是以人类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去规范和引导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理念。

三、生命活力：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是思想中的现实。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第588页）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不是一个僵化的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于它集中地体现了时代的特征、世界的潮流和创新的实践，在于它引导人类以新的文明形态去破解自身发展的难题。

毛泽东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页）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实践的品格就使得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使得它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使得它能够永葆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就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沿着马克思开辟的理论道路创新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活力，更为生动地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道义力量。

当前，中国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同时要具有世界视野。现代化是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也就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世界性的现代化过程既通过普遍交往把现代的科技、文化、制度和管理成果变成人类的共同财富，从而使得人类在整体上以加速度的形式实现发展，又通过普遍交往而构成

“全球化”的“现代性”问题，这就向人类提出了走出当代人类文明困境的时代性课题。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全面地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并提出了三大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问题：一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提出了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二是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说，提出了如何破解由资本的逻辑所构成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问题；三是从人与自我的关系说，提出了如何消除文化虚无主义问题。因此，对现代化的反省，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为依据、对当代人与世界关系进行全面反省；解决现代化问题，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为依据、对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探索和寻求。这就要求我们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开阔视野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推向新阶段。

总之，从现实中提出理想，以理想去引领和塑造现实，这就是实事求是、改变世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真理力量与道义力量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为我们指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道路，为我们提出了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任务。与人民群众共命运，与时代变革同进步，与创新实践同发展，我们就会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照耀下，克服前进中的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摘自2016年第7期《求是》）

在“两学一做”中突出看齐意识

王刚

新春伊始，党中央决定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这是新形势下我们党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部署，对于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重大意义。开展好“两学一做”，应突出看齐意识，在“学”与“做”中做到对照标杆、找准差距、主动看齐，实现全党队列整齐、步调一致，进一步增强我们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两学一做”是全党范围内一次“看齐”的总动员。“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十八大以来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之后，党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内教育方面的又一重要举措。与之前以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作为重点不同的是，党中央明确这次学习教育面向的是全体党员，并强调“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是一次活动，“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实现了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全体党员的拓展、从集中教育向经常性教育的延伸，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探索、新认识。

看齐意识贯穿于“两学一做”全过程。基础在“学”，关键在“做”。无论是学习党章党规、学习系列讲话，还是做合格党员，都是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正确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强化宗旨观念的过程，都是一次看齐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学习系列讲话，就是要认真学习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就是要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做合格党员，就是要向“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高标准看齐，向焦裕禄、孔繁森、沈浩等先进模范看齐，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

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以“三会一课”等党的组织生活为基本形式，涉及专题学习讨论、讲党课、专题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立足岗位做贡献等多种措施。只有把看齐意识融入其中，才能确保每一项措施都能取得实效，必须定位准、标杆高、行之笃，在实际行动中自觉向高标准看齐。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应切实发挥好表率作用，先学一步、深学一层，首先做到自己先看齐，在看齐的高度、深度、力度和广度上树立标杆。

看齐是增强“两学一做”针对性的有效方法。要带着问题学，针对问题改。一支队伍只有勤看齐，才会整齐划一；一个集体只有“人心齐”，才能实现“泰山移”。其根本方法就是勤看齐，通过找出“不齐”并加以改正，达到“看齐”的目的。当前，一些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存在理想信念模糊动摇、党的意识淡化、宗旨观念淡薄、精神不振、道德行为不端等问题，有的对涉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有的甚至对中央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这些“不大整齐”和“掉队”的问题如果不认真对待和解决，就会影响党的团结统一，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反之，解决好这些问题，就会使党员在政治上站稳立场、思想上辨明方向、行动上令行禁止，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开展好“两学一做”，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哪有问题哪出拳、哪壶不开提哪壶、哪个松弦紧哪个，找准问题、精准施策，在解决问题中增强看齐意识，实现同频共振、上下一心。

增强看齐意识，最根本的是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群力谁能御，齐心石可穿。”全体党员都应以自觉看齐的意识、敢于看齐的担当、善于看齐的能力，认真参加“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

（摘自2016年3月28日《学习时报》）

推动全球能源革命的战略构想

程志强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出，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这一重要论述顺应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大潮，明确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发展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战略方向，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能源领域的重要体现，对中国以至整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能源革命新构想

2014年6月，习近平同志就我国能源安全战略作出重要部署，提出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等能源领域“四个革命”的重要论断。中国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从能源输送、能源调度、能源供给三个方面对能源领域的全面革新，是对全球能源革命提出的创新性构想。它的提出符合我国能源革命的需要，顺应当前全球能源网络发展和技术创新趋势，有利于全人类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挑战。

特高压电网、泛在智能电网和清洁能源是全球能源互联网的三个关键因素。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以特高压为骨干网架、以各国泛在智能电网为基础、以输送清洁能源为主导的全球能源配置平台。特高压电网能以较低的损耗远距离输送大量电能，实现较为经济的跨区域跨洲输电；泛在智能电网使用智能化手段灵活调度能源，实现电网可靠、安全、经济、高效和环境友好；清洁能源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核能、海洋能、生物能等，储量充足，理论上只要开发其中一小部分便可满足人类现在的全部需求。有了特高压电网作为能源输送手段、泛在智能电网作为主要调度平台、清洁能源作为核心供应资源，全球能源互联网将成为互联互通的能源大网络，是全球能源资源配置方式的整体革命。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恰逢其时。当前，全球面临的能源和环境挑战日益严峻，能源技术发展革新步伐加快，世界各国正加快电网建设进程和清洁能

源开发利用，全球能源互联互通的网络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等问题，需要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因此，中国提出的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倡议得到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充分肯定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战略构想，表示将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大力支持和推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共同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世界银行行长金墉、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等都对全球能源互联网表示高度赞赏和支持，认为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实现清洁发展是一项宏伟目标和伟大构想。

能源发展新战略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倡议，体现了全球能源发展新的战略方向，表明中国正在以更积极的姿态推动世界能源发展。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构建和绿色能源的推广使用，有利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新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创新是全球能源发展的不竭动力。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能源输送、能源调度和能源供给的革命，必将在全球范围推动能源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协调是全球能源发展的必要手段。全球能源分布不均衡、发展不协调，全球能源互联网利用“一极一道”（北极风电、赤道太阳能）发电，通过特高压电网将电能输送到全世界，能实现全球范围的能源优化配置，为世界各国协调发展提供能源保证。绿色是全球能源发展的内在要求。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以绿色清洁能源取代化石能源，从源头上解决大气污染问题，有利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开放是全球能源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有利于各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打造能源领域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共享是全球能源发展的最终目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将清洁能源传输到世界各地，解决能源匮乏地区的发展问题，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

人类社会应对能源、经济、环境与和平发展挑战的重要举措。在能源消费和供给层面，全球能源互联网有助于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

能源消费；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保障全球能源供应；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推动能源体制革命，开辟能源发展快车道；推动能源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在市场和产业发展层面，全球能源互联网不仅能降低能源供应成本，取得联网效益；而且能带来巨大投资需求，推动金融市场发展创新，有效促进产融结合，带动全球产业链延伸；还能促进发展中国家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拉动当地经济增长；也有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能源企业转型，推动商业模式和体制机制创新，激发经济增长新活力。在环境保护层面，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将推动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降低能源的综合环境成本，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基本途径。在区域协调发展层面，全球能源互联网将为欠发达地区创造发展机遇，有利于消弭矛盾争端、维护世界和平、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是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全球能源互联网好比能源“新丝路”，必将以能源领域的互利合作有力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球互联互通、共同发展，推动人类文明持续进步。

能源经济新理论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能源经济理论的突破，是在能源发展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都具有深刻理论内涵。

微观上，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将使能源行业实现新的均衡。从能源供给的角度看，全球能源互联网充分利用规模效应，并通过这一效应扩大能源供给、缓解能源短缺。从能源需求的角度看，全球能源互联网通过加强互联互通，建立全球范围能源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大分工体系，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带动相关行业成长和能源需求提升。从能源外部性的角度看，全球能源互联网有利于实现“两个替代”，即在能源开发上实现清洁替代，以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推动能源结构从化石能源为主向清洁能源为主转变；在能源消费上实现电能替代，以电能替代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提高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

重。通过“两个替代”，全面推动清洁能源普及，能实现能源行业由负外部性向正外部性转变。

宏观上，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是统筹全球经济、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方案。全球能源互联网为人类寻找到经济、安全、可持续的替代能源，有利于突破能源生产可能性边界对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全球能源互联网能推动能源市场在广度和深度上提升效率，从而增加能源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不仅有利于改变国际能源领域的垄断局面，促进国际能源领域协作；而且有利于提升国内能源生产消费市场化程度，改善能源定价机制，倒逼能源体制改革，提高能源配置效率。

努力占领全球能源互联网构建的制高点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倡议，顺应和体现了新科技革命基础上能源市场全球化的发展潮流。作为倡议发起国，我国应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凭借在能源领域关键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努力占领全球能源互联网构建的制高点，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发展，努力发挥引领作用。为此，应从思想、管理、技术、资本等多方面着力，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加快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早日实现全球能源互联互通和共同发展。

推动思想理论创新。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首先有赖于思想理论创新，其次才是能源技术、体制以及管理创新。为此，应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全球能源互联网的重要论述，加强学科建设，在交叉学科基础上构建学科体系，探索建立新的全球能源互联网经济学，为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提供思想理论支撑。

搭建管理与合作平台。高规格的监管平台对于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至关重要，应给予高度重视。可以组建专门管理机构和协调监管单位，推动国家电网公司等能源企业走出去。参照国际组织标准，还可以组建全球范围的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定期举办全球能源互联网大会，推动世界能源互联互通，开辟能源“新丝路”。

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是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重中之重。在创新主体上，应尽快规划建设国家级研究院或实验室，同时由相关单位如中国电力科学院等牵头，加强国际技术互联互通，力求实现重大科研成果突破。在模式推广上需要“点面结合”：一方面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技术试点，先行先试，逐步形成技术配套体系；另一方面组织全球力量协同开发，使全球能源互联网更为先进、高效、安全。

优化资金支持环境。作为一项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需要进行全球范围的大规模资本运作，这离不开营造良好金融环境、创新融资模式。为此，应积极推动金融主体创新，可以考虑建立全球能源互联网投资基金和开发银行。同时，探索金融工具创新，试点发行全球能源互联网债券，构建与全球能源交易市场相匹配的全球能源期权、期货市场等。由此，全球能源互联网将为全球资本拓展新的投资空间，全球资本也将为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提供长期支持。

（摘自2016年01月26日《人民日报》）

高校建设“两个一流”应注重四个坚持

曹国永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继“985”“211”工程之后，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推出的又一重大举措，对高校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进程中，国家重点建设高校应积极行动起来，从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发展路径、发展资源的维度进行认真思考与顶层设计，突出办学特色，强化现有优势，对接国家战略，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创一流。

坚持发展定位差异化，做好“两个一流”建设规划。长期以来，高校发展定位的趋同令人诟病。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目标要求，社会对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的要求更趋多元化，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和学科也应多样化。世界一流大学既不局限于综合性大学，也不受制于学校规模，能够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作出一流贡献的大学，都有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这就要求高校必须遵循高等教育规律，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传承学校自身的历史文化，强化办学特色，避免千校一面，规划好学校“两个一流”建设的路线图与时间表，积极探索符合国情、校情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之路。

坚持发展目标科学化，把握“两个一流”建设方向。一流的学生是一流大学的根本特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必须将立德树人放在首位，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高校应当科学合理地确定“两个一流”建设的目标，坚决避免重科研轻教学，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将一流人才的培养作为“两个一流”建设的重中之重，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加强科教融合、产学融合，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同时，还应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的全过程，注重学生的历史

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教育，激励学生成长成才。

坚持发展路径特色化，选准“两个一流”建设突破口。建设一流大学必须以一流学科为基础。当前高校普遍存在学科建设资源分散，学科特色凝练不足，学科重点突出不够等问题，制约了学科建设水平的提升。高校应当发挥学科建设的龙头作用，进一步凝练学科特色，进一步汇聚优秀人才，将学科建设的重点确定为适合国家战略需求、具备良好发展基础、能够体现办学特色的学科，坚决避免平均用力，集中力量建设若干处于国内前列、在国际同类学科中居于优势地位的一流学科，使部分优势特色学科率先冲击世界一流水平，进而带动学校整体步入世界一流行列。

坚持发展资源多样化，确保“两个一流”建设保障有力。长期以来，高校的发展模式相对封闭、资源渠道相对单一。现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表明，建设“两个一流”需要较大规模的资源投入。在政府加大投入的基础上，一方面高校应当加快开放办学步伐，不断拓展开放办学的广度和深度，依托学科的优势与特色，促进学科、人才、科研与产业互动，推进与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的协同创新，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积极争取和吸引社会支持，不断拓展多元化筹资渠道，多方面汇聚资源，为“两个一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另一方面，高校要深入推进综合改革，激发办学活力，通过健全学科绩效评价机制和开展学科自评估等措施，不断淘汰对社会贡献不大、发展潜力不足的学科，进一步提升资源的配置与使用效益。

(摘自2016年04月07日《人民日报》)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生成

夏澍耘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一种独特方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我国人民民主的这一重要形式所体现的哲学智慧与思维方式，来源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而其具体发端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实践。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并初步形成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并在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培育和推动下日臻完善。

一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之“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第一核心要素和基本运作形式，也是达成协商民主的必由之路。“协商”的基本含义是指各参与主体通过平等真诚的讨论和对话，共同参与公共决策与国家治理，以求同存异、维护整体利益为原则，既尊重多数也照顾少数，既关注结果也重视过程，在相互理解和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达成最大共识。对中国而言，“协商”并不是一个新造或舶来的词汇，在中华民族的话语系统中，“协商”的本意就是“共同商量以便取得一致意见”，在此意义上讲，协商的前提、协商的过程无不贯穿着中华民族经典性的文化密码，影响最大的包括中华文化推崇整体系统与圆融感通的哲学智慧以及持中道求和谐的思维方式。

近年来，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达成的基本共识之一，就是认可中华文化的经典特色之一在于重“群”、重整体、重“大同”，这一价值取向背后深沉的文化根由，正是中华民族推崇整体系统与圆融感通的哲学智慧。

在中国哲学智慧里，天、地、人是彼此独立又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整体和系统。在天、地、人这个大的整体和系统中，组成其整体和系统的

不同部分和要素，又各自构成自身的整体和系统。各部分要素与整体系统间的圆融感通、有序运化，造就了生生不息的世间万象。而世间万物的感通互摄同样适用于人际人伦。因此，世间万物都是“相成”“相济”的，人与人之间也是可以相互感通、圆融互摄的，正如《易经》所言，“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哲学命题中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人际伦常中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体现的都是推己及人、感同身受、相互理解、对话沟通的感应会通。在1993年的《世界伦理宣言》中，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被尊为人类文明的黄金定律。其核心理念就是：成就他人就是成就自我，成就自我是在成就他人的共生关系中实现的。

这一哲学智慧基因不仅使得中国人在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时圆融有余，而且易于将哲学智慧转化为政治智慧和生活智慧，也易于在古老哲学智慧与现代协商精神之间构建一条穿越漫长历史隧道进行对话沟通的精神通道。现代协商精神强调主体之间的商讨互动，从而建立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并最终建立起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的系统状态。中国哲学智慧恰恰最擅长在多元差异中寻求理解、尊重、体谅、沟通，最终求得共识与共处，这既是中国智慧之长，又是协商之所以可能、共识之可以达成的基本前提。中国哲学智慧是整体思维智慧。它对于那些已经经历过主客体分殊的哲学时代而走向整体把握世界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想来说，很早就站在了人类哲学智慧的高端。圆融感通的整体智慧也为世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整体和合思维。中国语境中的“协商”渊源于此，而不是西方特色的“二元分殊”。

学界比较公认的中华文化另一特色就是思维方式上注重中道中和、和合和生。“中”“和”“生”蕴藏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奥秘，奠定了现代协商精神的文化基础，也为协商过程中具体处理好“多”和“一”的关系、顺利实现“多中求一”以及整体“度”的把握，提供了独特有效的柔性方式。

“中”较早见于《尚书·大禹谟》提出的“允执厥中”，孔子在《论语》中盛赞“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礼记·中庸》充分肯定“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先后以“中道”“中庸”“中行”等表述“中”，阐释适度、不偏激、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的思维状态，并把“中”与“和”联系起来，提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把“中和”视为天地万物良序运行的法则。

“和”在中国先哲那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多样性的统一，是谓“和而不同”“尚和去同”“和，故百物皆化”（《礼记·乐记》）。西周史伯把“和”与“生”联系起来看，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世界是丰富多样的，万物没有绝对的同一，以恰到好处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有差异之“和”，才会有天地万物的产生与发展，才能化生万物，此谓“生”。这是中华思维关于“中”“和”“生”相互关联的内在奥秘。

具体讲，“中”是一种兼顾多方、统合协调、去极端化、不偏不倚的思维方式，“中”的标准是是否“适度”或“适当”，而不是不讲原则的简单调和与折中，更不是墨守成规的保守主义；“和”也不是一团和气，而是“和而不同”，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不强求一致，以恰如其分的方式承认、包容并尊重差异；“生”是“中”与“和”的结果和表现，是事物基于“中”“和”之创造创新与变化发展，所谓“生生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系辞下》），“天地合而万物生”（《荀子·礼论》）。

持中道，求和谐，谋发展。“中”“和”“生”所涵养的思维方式不仅对中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助益中华民族历经5000年历史发展而没有发生大的文明断裂。在社会大变革大整合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正确看待社会矛盾，合理协调多元关系，避免动乱纷争，实现社会和谐，促进有序发展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华民族正是在

多元异质因素的和谐共处中，不断积聚活力与合力，在共利、共强的“群居合一之道”（《荀子·荣辱》）中，不断化生、创新、发展的。这正是今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能够在多元对话中求和谐、求合作、求共存、求发展的协商思维得以蓬勃生长的民族思维基因。

二

协商民主在中国的生成，不仅与中国古代哲学智慧、中国人民久已习惯的思维方式、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本政治学有着不解之缘，也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革命文化所直接催生。

正是基于人民解放的历史需要与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民主协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要彻底革掉封建专制之命，建立起与封建专制相对立的新型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本身就是一部彻底推翻封建专制、探索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

在这样的民主道路的追寻中，协商民主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其根基在广大人民群众，在于视人民群众为根本依靠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群众路线及其文化形式，就自然成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条件和基石。以“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核心内容的群众路线应运而生，是以群众的需求为奋斗的出发点，以群众需求的满足为事业的落脚点的。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群众路线的民主方式几乎是同时期酝酿产生的，二者构成了这一时期政治本质及其实现形式的基本逻辑关系。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此后无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启的、并事实上实践着的“总民主”。协商民主正是在这样一种革命文化背景中孕育、诞生的。

协商民主的具体产生，也离不开另外一个革命文化要素即“统一战线”，换言之，协商民主得益于“群众路线”与“统一战线”两大革命文化要素的共同催生，而此二者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优势的两大重要方面。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其实质也是群众路线，二者都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中就开始认真探索和积极推进的民主政治建设的两种实践形式，二者都旨在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实践主体、价值主体地位的树立和弘扬，它们共同催生并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实践的最初进程。

众所周知，由于身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纷繁复杂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就开始了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的征程。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共商”即共同协商，这一议决案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思维的最初运用，也是最早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编第10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在1924年至1927年的国共合作时期，“共商”得以延续，国共两党以政治协商的方式解决国事的积极探索，推进了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中国革命的特定需要、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以及民族智慧的特点与偏好共同作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就选择了以共同协商为重要基石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更加自觉地注重与其他党派团体和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在“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中，有效地进行了以协商方式建立新型人民民主政权的最早探索与成功实践。在“三三制”民主政权中，不仅有工农代表，还有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国家政权，已经具备了一党领导、广泛协商、包容合作等协商民主制度的基本

特征，具备了构成多样、主体平等、目标明确、遇事协商的组织特点。“三三制”既是统一战线，也是群众路线，是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事实意义上的协商民主的最初形式，也是今天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雏形。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逐渐走向成熟，党对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的把握更加科学，对自身政治道路与政治制度的思考选择、对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综合运用更加清醒自觉：一届政协的召开是协商的结果；协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协商民主最重要、最成功的现实实践；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标志着协商民主这种新型民主形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双周座谈会、协商座谈会和最高国务会议等协商议事方式，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与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协商，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协商民主渗透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呈现出广泛、多层和制度化的特点，并且在实践中继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从革命走向建设、从协商建国走向协商治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原生自在的协商民主，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觉自为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这一历史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制度选择上的文化自觉，是中国共产党自觉顺应中国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不是历史的偶然。它植根于几千年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传统，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化土壤，并在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涵养和引领下，发展成为形式更加完备、方法更加多样、制度更加健全的民主政治模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色和突出优势，也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摘自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互联网+”：发展分享经济的引擎

张永军 张影强

在经济新常态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发展分享经济，提出要实施“互联网+”，发展分享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指出，我国将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指出，分享经济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

一、分享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一）分享经济是全球经济的新亮点

全球产出增长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大幅下滑，自金融危机以来，许多经济体一直面临生产力增速放缓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5年至2020年，发达经济体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从金融危机后六年的1.3%回弹至1.6%，但仍远低于危机前2001年至2007年期间2.25%的平均值。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的状况更加严峻。2015年至2020年，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潜在增长率将从2008年至2014年的6.5%进一步下滑到5.2%，比危机前水平下降近两个百分点。正当全球经济低迷之时，分享经济却一枝独秀。全球分享经济的领军企业美国的UBER（优步）和Airbnb（空中民宿），中国的电子商务，最近几年均呈现了爆发式增长，并带动快递等行业的蓬勃发展，引发了分享经济模式在房屋租赁、交通出行、家政、酒店、餐饮等多个领域的创业潮。

（二）分享经济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市场萎缩，我国面临产能过剩、老龄化凸显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等方面的问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投资回报率降低，也造成了社会资源闲置浪费和产业结构失调。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成为“十三五”时期及未来更长

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16年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分享经济依托互联网技术，能有效减少供给和需求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去产能、去库存和降成本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分享经济尽管在中国起步较晚，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鼓舞下，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涌现了“滴滴出行”“途家”“小猪短租”“回家吃饭”“陪爸妈”等体现分享经济理念的企业。我国将是下一阶段体量最大、最受关注的市场，分享经济给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也必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分享经济规模约为1.95万亿元，参与分享经济活动人数已经超过5亿人；预计未来五年分享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40%左右，到2020年市场规模占GDP比重将达10%以上。

（三）分享经济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进行的革命

分享经济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的革命。在“供给侧”，通过互联网平台，可以实现社会大量闲置的资金、土地、技术和时间有效供给，解决当前我国资源紧张和大量闲置浪费并存的现象，将居民私有资源转化为社会的公共供给。比如，可以将赋闲的专业技术人才转化为社会的有效供给，缓解当前我国教育、医疗、养老等政府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在“需求侧”，分享经济则能有效匹配消费者的需求，以最低的成本满足需求。消费者节省了大量的“搜寻成本”，能及时了解其他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真实评价，提高了整个社会消费者的福利水平。

二、分享经济集中体现“五大发展理念”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发展分享经济是重要举措。

（一）创新发展是分享经济的根本动力

分享经济是伴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应用而兴起的，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源的使用而非拥有为产权基础，通过以租代买等模式创新，实现互通有无、人人参与、协同消费，

充分利用知识资产与闲置资源的新型经济形态。当前分享经济的领头羊优步、空中民宿和滴滴快的等公司，无一例外是互联网高科技公司。这些公司均搭建了互联网第三方平台，能精确地动态匹配闲置资源的供需双方，实现闲置资源使用权交易。通过互联网平台，消费者可以便捷地约车、搭车，价格明确，支付方便；可以租住私人住宅，更好地获得本地化的旅行体验。另一面，资源提供者可以用私家车或家中闲置房间获取收益。这样的商业模式创造出全新的用户体验、供应源及市场，同时减少了浪费，提高了社会资源使用率，有助于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上述模式，为住宿、出行等传统行业存在已久的供求难题提出解决方案，打破了传统规则。本质上则是源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二）绿色发展是分享经济的重要特征

分享经济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能有效减少投入和节约成本，实现消费模式从“扔掉型”转变为“再利用型”，通过社会存量资产调整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合理分配和资源及商品最大程度的利用。从全社会看，分享经济增加了有效供给，节约了资源，保护了环境，将有效推动绿色发展。分享经济通过物尽其用，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统一，顺应了绿色消费、绿色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面对住房、汽车、书籍等多类商品，变单独占用为共同分享，使物尽其用，成本低廉。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匮乏，分享经济无疑对节约资源能源、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协调发展是分享经济的内在要求

分享经济强调人人参与，互联网平台打破了地域、城乡、国别、性别等限制，对参与人平等开放。不管你身处富裕的沿海地区，还是在沿边落后地区，只要有条件接入互联网，分享平台对所有符合规则的人都是平等的。互联网的公平接入特性使得分享经济能有效地缩小城乡差距，就业和提供商品及服务的门槛降低了，边远和落后地区也能有同样的机会参与，减少了机会不平等，能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比如，在优步、淘宝和

空中民宿等互联网平台上，所有企业和个人都能共享全球市场，消费者也能选择全球各地的商品和服务。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分享经济更是减少了区域间的不均衡现象。

（四）开放发展是分享经济的基本理念

唯有开放，分享经济才更加具有生命力。互联网、智能终端和物联网的发展使得任何人和物都具备了互联的条件。分享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开放度大大提升，通过开放不断降低成本，持续创新，促进快速增长。比如，全球最大的移动交通平台滴滴快的仅用3年时间，移动出行平台上就活跃着3亿乘客和超过1000万的注册司机，占有中国专车市场份额的80%、中国出租车召车市场99%的份额、用车次数是优步全球规模的3倍。再比如，空中民宿对所有想出租自己房产的人开放，从2008年创立仅用了7年时间，就已经在全球190个国家34000多个城市提供了6000多万个独一无二的客房，这一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万豪、希尔顿、喜达屋等任何一家经营多年的全球连锁酒店集团。

（五）共享发展是分享经济的落脚点

分享经济使所有参与人共享财富，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分享的目标。美国有关机构调查显示，在美国多数城市，空中民宿上的公寓价格要比一般酒店便宜21%左右，消费者乐意从海量的个人租户那里寻求房源。滴滴快的公司提供的顺风车服务价格是出租车价格的40%，社会也实现了绿色出行和碳排放减少，车主分摊了出行成本，乘客降低了乘车成本，所有参与方实现了共赢。在我国，共享理念的实质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享应该是分享经济的落脚点和归宿，唯有多方受益，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

三、“互联网+”是分享经济发展的引擎

（一）互联网普及是分享经济发展的基础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分享经济便作为“协同消费”或“合作式消费”的概念而被提出，但发展并不快。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移动互联网

快速普及，分享经济在全球快速发展，创新不断涌现，企业规模呈几何倍数的增长，参与的人数迅速上升。互联网使得任何人和物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约束实现互联互通。可以说，分享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是互联网的发展。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的全球互联网使用情况报告显示，到2015年底，全球网民数量达32亿左右，而在2000年全球仅有3.61亿网民。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其中，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有90.1%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移动互联网迅速普及与深化应用，极大地推动了分享经济的创新发展。

（二）“互联网+”是分享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互联网是分享经济的基础，互联网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在社会生活和政务服务等领域的深度应用是分享经济发展的土壤。“互联网+”战略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后，得到各部委和地方的高度重视，国家密集出台文件部署推进工作。围绕“互联网+”，政府在推动电子商务、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制造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并全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政府也在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普惠金融、公共服务、高效物流、电子商务、便捷交通、绿色生态、人工智能等领域，着力推动互联网与相关产业（领域）的深度融合。在“互联网+”新环境下，从互联网、物联网到人联网必将有力促进分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健全的互联网社会治理机制是分享经济发展的保障

分享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是新事物，我国也正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现行法律和法规既无法规范分享经济的发展，也无法有效解决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争端。以交通出行为例，互联网平台企业调动私家车参与营运，存在税收和监管方面的缺失，对传统出租车司机和公司的利益带来影响。此外，部分互联网平台企业准入门槛不高，约束不足，员工一般不具备相应运营许可或职业认证，平台企业很难确保安全保障义务和服务质量。如果没有一个与互联网社会相适应的治理机制，就无法保障分享经济健康发展。

四、创新治理方式，助推分享经济发展

（一）更新理念 创新监管

分享经济是大众参与的商业模式，政府的监管对象庞大并有一定的虚拟性，监管内容快速增长，需要及时调整监管和治理模式。市场监管部门要积极地适应新常态，解放思想，转变监管理念，塑造互联网监管思维，发挥大众评价、企业治理、行业自律等多方作用，建立多方协同治理机制。创新监管方式，利用大数据技术等加强监督检查和违规处置，建立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加大失信惩戒力度。诚信是分享经济发展的基石，信息技术确实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但无法从根本上保证双方信息的真实可靠，需要各参与方恪守诚信。英国、美国等分享经济发展快，很重要的原因是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诚信体系，分享平台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政府信息资源。我国政府应整合分散在各个部门的信用信息，利用已有认证系统。另外，向分享经济平台开放电子化的犯罪记录等相关信息，并降低开放的门槛和费用，使参与者能低成本获取相关信用信息。要培育专业的信用服务公司，构建用户信用评级系统，将分享经济中的诚信者和欺诈者纳入目录，并对信用极差的个人或企业进行披露。

（二）拥抱创新 趋利避害

分享经济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大，产能过剩、库存严重和杠杆过高等问题突出，分享经济能有效利用产能和降低库存，破解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政府首先要鼓励创新，不仅要营造企业创新发展的环境，更需要创新治理方式来适应分享经济发展的要求。当然，任何新事物都有两面性，有利也有弊。分享经济的发展，导致个人信息和隐私暴露的风险加大、传统企业收入减少、一些人失业、新的法律纠纷增加等。这些不稳定、不安全因素也使有的部门不会管、不敢管，导致新的风险不断聚集；有的部门对新事物“严加看管”，对任何不符合现有法规的“一棍子打死”，阻碍了创新。作为市场监管者，要科学认识新生事物，最大限度地保护创新；同时也要坚守监管的底线，在最大限度保护创新的同时，将

风险降到最低。

(三) 完善法规 保障发展

在分享经济模式下，现有法律和规范存在模糊边界，相关的保险、税收、劳动法等法律法规也不尽符合分享经济发展要求。应及时修改相关法律法规，这是当前全球分享经济发展亟须解决的共性问题。英国提出了要建设“全球分享经济中心”的战略目标，率先修改了税收政策。美国旧金山政府也就网上短租修改了相关法律。对我国而言，亟须制定适应分享经济的法规，并对网络平台和专业从事分享经济的中介公司加强监管。修改现有涉及分享经济的民法、商法、合同法、保险法等相关法规。加强商品和服务提供者的资质审查，调整分享经济模式下的财税政策，规范交易行为，保护交易双方和政府的合法权益，有针对性地对民办分享设施建设进行财政补贴。

(摘自2016年4月7日《光明日报》)

锐词(19)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2016年1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生态+

“生态+”，这是一种更高形态的发展之路，就是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一种发展新模式。它并非简单叠加，而是通过深度融合，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征信依赖症

指不管大事小事，都要纳入公共征信系统做法。例如，有的地方提出将把“宠物扰邻”行为纳入公共征信系统。有评论认为，不从根本上入手，只希望图简单省事，把征信系统当万能药到处使用，无疑是患上了“征信依赖症”，这会导致征信系统“负荷”太重，削减征信制度本身的严肃性。

轻公益

指一种开放和轻量化的公益形态，特点是简单化、轻松化。轻公益作为一种公益理念，它的目标是推动开放和轻量化的公益模式，降低人们投身公益的门槛，让公益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推荐书目（17）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

中共中央宣传部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围绕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学习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十六个专题，全面准确深入阐释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